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西汉前期匈奴形象与 汉匈交流之探讨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陈淑菁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叶秀清老师

呈交日期：19.8.2016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前言	1
第一章 汉人眼中匈奴形象之转变	5
第一节 匈奴强者形象之变化	5
一、白登之围后强者形象之树立	6
二、文景二帝时强者形象之削弱	7
三、汉武帝时期强者形象之瓦解	9
第二节 “戎为禽兽”论述之衍化	11
一、托词“禽兽”以达贬斥之效	12
二、打破“戎为禽兽”论之迷思	13
三、“戎为禽兽”用为论辩说辞	14
四、以文化差异为根据立论思辨	15
第二章 北方汉匈交流概况与其研究	17
第一节 汉人羁北之缘由与心态	18
一、迫不得已之选择	19
二、常复思归之心态	20
第二节 北地胡风南传之途径	23

一、羁北汉人后裔之归国	23
二、汉朝使者之获释南返	24
三、往返南北之私人商贾	26
第三章 中原汉匈交流概况与其影响	27
第一节 俘虏、屯兵与关市	27
第二节 归降于汉朝之匈奴贵族	29
第三节 借军政累劳积功之匈奴	31
结语	34
参考书目	37
附录	42
表一：汉武帝征伐年表	42
表二：汉高帝至汉景帝间反贼与匈奴合作列表	44
表三：汉武帝时期捕获俘虏列表	45
表四：汉景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46
表五：汉武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47
表六：匈奴立军功封侯列表	49
图一：汉高帝至汉景帝间反贼与匈奴合作数据	50
图二：西汉时期大漠南北形式示意图	50

西汉前期匈奴形象与 汉匈交流之探讨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西汉初期，匈奴人因资源不足而对汉朝边境进行掠夺，形成汉人与匈奴接触的最初形式。先秦以来所产生的误解，无疑阻碍着双方进一步交流。所幸在汉武帝以前，汉人已逐渐打破迷思，改变本身对匈奴的既定形象，使汉匈交流变得顺利。自此，汉匈民族间大量及多方面接触，达到正面的交流和交融，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内涵。

本文锁定汉高帝至汉武帝时期的汉匈交流情况为研究范围，第一章首先揭示汉武帝以前匈奴形象在汉人心目中的转变经过，第二章探讨汉人以何种形式与心态融入匈奴的大环境中，第三章则探讨匈奴以何种形式进入中原，而后面两章将据此论及其影响。

关键词：西汉前期、汉匈关系、民族交流、匈奴形象

致谢

本论文终于得以顺利完成，首先必须感谢叶秀清老师不遗余力的指导。感谢叶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的疑惑，耐心指正学生的错误。叶老师专业的指导和建议，让学生受益匪浅，在书写的过程中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和技巧。同时，叶老师无论是在研究课题、书写和时间安排上都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让学生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又能随着自己的安排一把论文完成，令学生充满成就感之余，又提升了学生的使命感，以期不辜负老师的信任。

此外，也非常感谢大学时期的一帮好友，在论文进行期间给予的勉励和关心。每当心烦意躁，他们都成为我倾诉的对象，并且会给予恰当的建议。我们互相分享自己的论文成果，除了可以互相学习外，还可以顺道釐清自己的思路，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就此迎刃而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互相监督彼此的进度，抱着一起毕业的决心全力以赴。一些格式上的疑问，也是寻求他们的帮助。除了同一学期的好友，还想特别感谢学姐梁慈珉。面对一些文献不足的问题时，慈珉常常尽最大的能力给予帮助，以其所具备的知识推荐我一些古书的索引和专业版本的书。

最后，还要感谢家人和吉隆坡友人一路以来经济上的支持和体谅。为了到马来亚大学和新纪元学院图书馆寻找著书，我数次乘搭火车南下吉隆坡，又因复印之需而购买了该图书馆的影印卡，昂贵的费用在家人的支持下无需太过烦恼。吉隆坡友人更是多次提供住宿、交通与三餐之便，让我在吉隆坡期间无需

担心吃住的问题。他们的鼓励和陪伴，往往在我心情低落之时化为贴心之语，让我重拾动力与信心。

耗时一年的论文终于完成，当中拌着我整个大三的笑与泪，成为我检定自己大学三年的学习成果。感谢大学期间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都尽力将自己的知识传输给我们，从而让我们有了扎实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无论是文、史、哲等领域的专业，还是做研究的方法，都让我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肯定了自己这三年所学所得。

前言

匈奴以部落联盟的形式活动于中原之北，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 3 世纪）经历了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边与中原“诸夏”展开一些小规模的战争，掀开匈奴与中原接触的历史。史书零星记载了战国时期猗狁、荤粥、鬼方等势力对晋国、燕国、赵国、秦国的侵扰，而猗狁、荤粥、鬼方，正是匈奴在先秦的称谓。

公元前 3 世纪，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四处征服西域诸小国，并以汉朝为主要侵略目标。此时，汉人与匈奴已是两个重合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民族和政治体。论及汉人与匈奴在西汉初期的关系，多数学者以“汉初，由于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抗拒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直至武帝即位之后，采纳抗战派的主张，才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林干，2007：2）为总结。此论点并没有很好地统摄汉初的情况。举例而言，文景帝并非完全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而汉武帝也不是一味抗战，本身亦有和亲之举。

当中，还属张美华与张美娟〈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初探〉把汉匈关系处理得较为全面，讨论匈奴被汉化的原因与表现。高红梅〈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也略谈汉匈后期的发展与影响，恰好可以补充张美华和张美娟的论述。然而，双方只谈到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却忽略了匈奴文化是否也对汉人有所影响。或许是缺乏与匈奴相关的史料，学者必须尝试以考古学、社会学等方法挖掘新材料，才能研究得更为全面。这一方面，王涛的〈略述匈奴与中原物质技术的交流以及汉匈在文化上的融合〉便深入而具体地讨论了双方交融的细节，包括物质

技术、民族性、文化风俗、教育、文字等，探讨民族交融下的改变，考验极具细致的考古学功夫。王涛在各别课题上颇有一番见解。他深入探讨了匈奴的民族特性，综合出匈奴好利、贵壮与尚武的特质。遗憾的是，其论述倾向以汉人价值观看待匈奴，以致过度批判匈奴好武尚利，忽略了北方环境与游牧经济的生存因素，显得不够客观。

论及汉人投降于匈奴的课题，马鑫与尚焯的学刊论文〈试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将领〉，以及蒋晓莹的〈从《史记》看汉匈关系对刘邦大臣谋反的影响〉都整理了这些个案的前后情况。马鑫和尚焯的结论强调了汉人的背叛之举，虽留意到人物因政治环境而受到的内心煎熬，却忽略了当中汉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因素。蒋晓莹则为此课题提出新视角，认为汉人投靠匈奴之举是早有预谋的退路。此外，张天竞在《论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提出“匈奴和中原国家双边交流的前提是双方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之中，如果双方因为利益冲突而爆发大规模战乱，双边交流即便不中断也会因双方相互敌视而大受影响”（张天竞，2012：55），此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论文第一章就刚好证明了战争也是交流的一部份，也会带来积极和正面的接触效果，就如晁错将匈奴当成客观的对手来看待，《淮南子》和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更是汉人对民族关系进行思考的产物。

早在西汉初期，汉人与匈奴的交往已深入发展至文化层面。随着战争、互市、迁徙、杂居的形式，汉匈关系不再停留於表层接触，而是逐步趋向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甚至精神上的交流，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内涵。当中便涉及了不解、接触、冲突、分享、认同与同化的交流过程。郑晓云进一步论述：“民族偏见是一种不客观的对于其他民族的看法，当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等与自己不相符时便

从自己民族的基准出发去加以否定，并形成固定的看法……影响到民族间的交往与团结，甚至引起民族间的冲突。”（郑晓云，1992：149）匈奴多次侵汉及掠杀汉人，加上习俗的不同，导致汉人对匈奴的抗拒颇深。在这种心理因素下，汉人对匈奴的误解和抗拒是如何逐渐瓦解？两者的文化与民族又是如何从矛盾对立而渐趋融合？

为了釐清这些问题，就有必要深入研究汉人与匈奴最初的接触历程，而以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最为重要。汉高祖时，匈奴已达到团结，即统一于单一的领袖——单于之下，且拥有广阔领土，达到其帝国史上之巅峰。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与汉高祖开战，拉开了冲突与交流的序幕。而汉武帝的大征讨，更是把汉匈关系推上另一层发展，使汉人与匈奴透过战争、俘虏、投降等方式，展开了大规模的相冲与相融，让汉人与匈奴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接受向前迈进一大步。

本文遂以汉高帝至汉武帝期间的汉人与匈奴关系为研究对象，透过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来探讨汉匈关系的问题。在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论文主要依据《史记》与《汉书》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史料分析和概括归纳，揭示双方最初的交流情况。当中还谈及了文化认同的课题，探讨汉匈民族交融的过程。然而，史书文献无法提供新材料来取得新的研究结果，所幸本文以形象研究作为新的视角，并在不足之处转引考古学研究的学者论文来作补充。

本文第一章将探讨匈奴形象之转变，以全面了解汉人对匈奴从不解到消除误解的情况。除了客观的局势考量，匈奴的强者形象也是促成西汉初期实行和亲政策的一部分原因。文景两帝的防御对匈奴强者形象的打击也是汉匈关系所可以关注的现象。事实上，汉人对匈奴所具有的既定形象形成了双方的误解，

阻碍两者的交流。因此，在研究西汉早期的汉匈关系时，匈奴形象之改变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第二章论述汉初至汉武帝期间汉人融入匈奴族群后所面对的汉文化牵绊。该章节以投降至匈奴的汉人、被拘留的汉朝使者、往来两地的私人商贾和在匈奴出生的汉人后代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三章则论述匈奴融入汉人族群的方式。在汉初至汉武帝期间，屯兵、关市、俘虏促成了匈奴融入汉人之中。当中还包括降汉的匈奴人、属国的建立以及在朝中和军中任职的匈奴人。这些种种都是汉人与匈奴得以展开交流的最初方式，并使汉匈关系在西汉后期、东汉甚至魏晋以后发展得更为密切。

第一章 汉人眼中匈奴形象之转变

在汉人与匈奴人展开交流之前，汉人已经对匈奴抱有一定的成见。当双方展开最初的接触时，这些误解会阻碍双方的交流与文化接受。因此，在研究西汉初期汉人与匈奴的关系时，不可忽略匈奴在汉人心目中形象的转变及其影响。西汉之初，汉人不甚理解匈奴的习俗，受到先秦“戎为禽兽”论和匈奴弱小形象的影响而轻敌。其后，白登山之围塑造了匈奴的强大形象，导致一部份的汉人惧于与匈奴对战，两者在这段时间里面临了开战空窗期。此时汉人也只能依靠“戎为禽兽”论贬低对方，方能不在匈奴的强大形象下陷入自卑。所幸汉文帝与汉景帝的防御举动逐步打破匈奴高高在上的强者形象，加上汉武帝时期汉匈的日益接触，汉人逐渐消除本身所误解的匈奴形象，开始能够客观地将匈奴放在对手的位置来分析双方优势。其中更有汉人对他们的文化习俗作出深刻的思考，为后来的文化交融和接受建立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戎为禽兽”论也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被当权者所利用，成为抨击匈奴的方式。

以下分为两节，各别叙述匈奴强者形象与禽兽形象之转变。第一节揭露不同时间段内汉人眼中匈奴形象强弱的转化及其根因。第二节则探讨汉匈民族交往过程中所衍生的“戎为禽兽”论在历史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一节 匈奴强者形象之变化

汉高帝初期，匈奴在汉人心目中有着弱小的形象，因而汉人无惧与匈奴正面冲突。也正因这种轻敌，导致汉高帝被围于白登山，失败而归，遂而形成匈奴的强者形象。自此以后，汉高帝、汉惠帝和汉高后都选择消极应对匈奴，而

匈奴的强大形象更成为了朝廷不与匈奴开战的理由。直到汉文帝与汉景帝尝试在这一情况下发兵防御匈奴，才突破了匈奴强大而不可攻打的形象。至于汉武帝对匈奴的征讨，更是瓦解了汉人心目中匈奴始终强势的形象。以下深入分析白登山之围前后、文景二帝与汉武帝时期匈奴形象的转变及其中的历史因素与结果。

一、白登之围后匈奴强者形象之树立

汉朝建立之初，汉人忙着推翻秦朝，稳定政权，无暇顾及边境的匈奴之害，与匈奴的接触和了解都极为有限。在这情况下，汉高帝等人直接接受祖先对匈奴“戎为禽兽”的舆论，由此而对匈奴产生弱小和“不文明”的印象¹。如韩王信凭借自信，看贬匈奴，而自请驻守更靠近边塞的马邑，可见匈奴对他而言是弱小而无须畏惧的。《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也记载了使者对匈奴的误解：

“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司马迁撰，1959：2718）

汉人对匈奴的不解，令汉使者凭借本身对匈奴的固有认识，而先入为主地断定匈奴之弱小。眼前所见的“老弱”和“羸畜”，正好让他们证实匈奴的弱小形象。直到匈奴围汉高帝于白登山七日²，方才打破汉强匈奴弱的既定印象，匈奴形象自此以后变得强大，加上汉高帝作为汉朝开山皇帝却败于匈奴，对汉人而言无疑是一大冲击。

¹ 本文第一章第二节将进一步叙述。

² 详见《史记人物与事件》：“汉七年，韩王信投靠匈奴，高祖亲自领兵讨伐。军队来到平城时，被匈奴围于平城东南的白登山七日，败战而归。”（王明信、可永雪，2005：149）

白登之围后，自汉高帝九年（公元前 198 年）起，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的二十年间³，朝廷不再与匈奴开战，而是采取消极的回应政策⁴。白登之围更是成为了朝臣反对与匈奴正面开战的最佳理由。以季布为例，当时吕后本想与匈奴开战，而季布却在此时说：

“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嗟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司马迁撰，1959：2730）

季布以汉高帝失败而归一事反对开战，虽距白登山之围已有七年之久，对朝廷上下依然有所震慑，“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司马迁撰，1959：2731）由此可见，白登之围后，匈奴的形象由弱小变为强大，对朝廷影响深远。

二、文景二帝时强者形象之削弱

直到文景二帝时，匈奴的强大形象方才有了消退的迹象。当时，以和亲作为阻止匈奴侵边的政策效果有限，汉文帝和汉景帝只好发兵防御匈奴。他们致力提升边境地区的繁荣和生活水平，为驻扎边境的兵民补充粮食，招募农民百姓输送粟食至边境作为军粮，更不惜以爵位奖赏响应朝廷政策的平民。在一系列举措下，朝廷几次派兵防御都成功击退侵略边境的匈奴。然而迄今为止，许

³ 林干在《匈奴史》中针对朝廷派遣公主和亲的记载，计算出从汉高帝九年（公元前 198 年）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开始，至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发动大征讨为止的时间段。

（林干，2007：45）基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以后朝廷已有遣兵击匈奴之举，故笔者在此处作了调整，将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定为结束消极政策的年份。

⁴ 根据林干在《匈奴史》的分析，西汉和亲政策的条款大致可分三项：①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阙氏，另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②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③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区是匈奴的游牧地带，归单于管领；南面“冠带之室”是汉族耕织的领域，由汉帝统治。（林干著，2007：45-46）

多学者只注重文景二帝与匈奴的和亲⁵，而忽略汉文帝长达十五年及汉景帝大约七年对匈奴的发兵防御，以及这一举动对匈奴强者形象的打击。同时，这些学者在探讨汉文帝为何只是防御而非征伐的原因时，则多归咎于当时时机尚未成熟得足以让其大肆举兵，反受制于诸侯王势力坐大、经济困窘和缺乏良将等。学者熊贵平和王扩建甚至推测，汉文帝所采取的政策，与其以高帝庶子即位的身份，导致权威不足有关⁶。综合这些学者看法，还可以推测汉人在匈奴强大形象下所形成的忌惮，或许也间接影响了文景二帝不主动征伐匈奴。

虽然如此，文景二帝时期防御成功的战绩还是击破了匈奴的强者形象，证明匈奴并非想象般不可对抗。朝廷上下面对匈奴时，逐渐改变了本身软弱的姿态，以贾谊和晁错两人相隔六年的谏言便可探出其变化。贾谊在汉文帝五年（公元前 175 年）提出建三表、设五饵，侧面以财物诱之的方法对付匈奴⁷。深究其建议，不过是攻击匈奴贪利的弱点，而非以武力正面对抗。反之，到了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 169 年），晁错的谏言与贾谊的建议在本质上已有所差别。晁错在谏言中客观看待匈奴的强大之处，理性分析匈奴与汉朝的不足⁸，提议加

⁵ 其中注意到文景二帝防御之举的学者有雍秉乾（2000），〈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43-44页；熊贵平、王扩建（2005），〈孝文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及影响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2期，第67-72页。然同时，雍秉乾难以避免地陷入了文景二帝同时实行和亲政策和防御政策的误区，而跳入“避免了跟匈奴的正面冲突，换来了边塞与中原腹地的相对安定”的结论。相对来说，熊贵平和王扩建却注意到孝文十四年左右是汉文帝从防御政策转向和亲政策的重要时间点，而对孝文帝的防御原因和影响作出了探讨。

⁶ 详见熊贵平、王扩建（2005），〈孝文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及影响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2期，第68页。

⁷ 详见《新书·匈奴》：“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故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下胡抑抃也。此谓五饵。”（贾谊撰，2000：135-136）、《新书·铜布》：“……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矣……”（贾谊撰，2000：111）

⁸ 详见《汉书·爰盎晁错传》：“是时匈奴疆，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曰：‘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

强边境防御，正面与匈奴对战。晁错把匈奴放在对手的位置，言行中不见其受匈奴的强者形象影响而产生退缩之意。除了晁错，汉文帝时还有颍阴侯灌婴与安丘侯张敖等将领带兵对抗匈奴，以及平原君朱建之子出使匈奴并责骂单于⁹，更有群臣力谏发兵征讨闽越与匈奴；汉景帝时，则有李广、郅都、冯敬长期驻守边境防御匈奴。由此证明，屡次防御成功后，匈奴强者的形象在汉人心中已有所消歇。

三、汉武帝时期强者形象之瓦解

匈奴的强者形象虽自文景二帝后便有所消歇，但也并非毫无影响。就如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时，匈奴派遣使者前来请求和亲，汉武帝召群臣商议，提倡和亲的韩安国与鼓励出击的王恢展开了一场辩论¹⁰。在这场辩论下，韩安国的和亲主张获得许多大臣支持，可见匈奴的强者形象依然影响着一部份人，甚至左右了朝廷和亲或攻击的决策。

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箭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班固著，1962：2278-2281）

⁹ 详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朱建之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司马迁撰，1959：2703）

¹⁰ 详见《汉书·窦田灌韩传》：“大行恢议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彊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廩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通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輓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御史大夫安国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谿，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 ”（班固著，1962：2398-2403）

正当朝廷依然被匈奴强者形象的阴影笼罩着，汉武帝却已打定主意征伐匈奴¹¹。政治、经济、战马等条件的成熟，都是促成汉武帝得以大举征伐匈奴的因素。同时，匈奴强者形象在文景二帝时的消竭，就某方面而言也影响了汉武帝的大征讨。匈奴的形象已不再如汉惠帝和汉高后时期那般，被认定为不可侵犯。随着这种观念的改变，汉武帝决定征伐匈奴时才没有受到大臣的激烈反对。王恢便是在此时提出马邑之谋，但究其本质也是为了避免汉军与匈奴军的正面对战，才使计诱单于入马邑以围之。虽然如此，单于尚未踏入马邑便已离去，王恢只好领兵返回。当时，王恢向汉武帝解释道：

“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裊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司马迁撰，1959：2863）

王恢自认不敌而不欲对上匈奴军，首次出击的汉军无功而返。当中不乏匈奴强者形象影响，以致王恢在拥有三十万大军的情况下，仍然觉得不敌单于十余万匈奴军¹²。

马邑之谋虽然失败，却掀开了汉武帝时汉军与匈奴开战的序幕¹³。英勇与匈奴对战的将领包括李广、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息、霍去病等等，可见汉人眼中匈奴强者形象的枯竭。当中虽有反对朝廷攻击的声浪，如齐人主父偃、严安与博士狄山，但也不再是因为匈奴的强者形象而有所退缩惧怕，而是基于

¹¹ 对于汉武帝的转变，马晓丽认为汉武帝的思想有着由和亲向“图制匈奴”的思想转变，并将之归咎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复仇心理等原因，但笔者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月氏共谋击匈奴一事中认为汉武帝早已有意对付匈奴。详见马晓丽（2007），〈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第47-52页。

¹²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即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僕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重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班固著，1962：162-163）；又《汉书·窦田灌韩传》记载：“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当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班固著，1962：2404）而得汉军三十万、匈奴军十余万之数。

¹³ 详见附录表一：汉武帝征伐年表。

军费耗损甚大的客观考量¹⁴。朝廷多次派兵与匈奴对战的举动甚至鼓动了平民百姓，例如河南人卜式便愿意捐出其财物帮助朝廷对抗匈奴：

“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班固著，1962：2625）

卜式的例子证明了匈奴的强者形象在汉武帝时期已全面地瓦解，汉朝上下已不再对匈奴有所惧怕。随着汉武帝多次北伐匈奴成功，匈奴的强者形象彻底瓦解。

第二节 “戎为禽兽”论述之衍化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魏絳说“戎，禽兽也。”（李学勤主编，1999：836）

自先秦以来，这种“戎为禽兽”的论述非常普遍。中原人面对周边的蛮夷戎狄，因不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而对这些外族产生负面的印象，“戎为禽兽”的言论便由此延伸。先秦著述中，记载了不少将外族等同于禽兽的言论，如《诗经》和《礼记》有“蛮貊”一词¹⁵，以带有野蛮、粗野、凶恶的“蛮”字称呼南边的外族，以野兽“貊”称呼北边的外族。此外，还有《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李学勤主编，1999：303）；

《国语·周语下》记载周定王言：“夫戎狄……若禽兽也。”（徐元诰撰，2002：58）；和富辰之语：“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不可馱也。”（徐元诰

¹⁴ 详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齐人主父偃曰：‘……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司马迁撰，1959：2955）；“（严安曰）：‘……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司马迁撰，1959：2959）；《史记·酷吏列传》：“（博士狄山曰）：‘……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司马迁撰：1959：3141）

¹⁵ 《诗经·閟宫》曰：“至于海邦，淮夷蛮貊。”（李学勤主编，1999：1422）；《礼记·中庸》曰：“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李学勤主编，1999：1460）

撰，2002：49）。透过《左传》、《国语》、《诗经》、《礼记》等先秦典籍，可以证明外族与贬义色彩非常浓厚的“禽兽”一词挂钩，是自先秦以来长期与普遍的论述，当中很直接便能看出汉人极度贬低与排斥其他民族的态度。笔者遂基于此而将之概括成“戎为禽兽”论，再对“戎为禽兽”论延续到西汉后的情况作出详细论述。

先秦的“戎为禽兽”论，使汉人对匈奴产生卑微弱小与“禽兽”的形象。就算白登山之围打破了匈奴的弱小形象，汉人依然不断贬低匈奴。直到汉文帝中期，汉人积极面对匈奴作为对手的身份，方才打破了主观的“禽兽”标签，并随着双方的接触，促进汉武帝时一部份人对汉人与匈奴的关系做出成熟的思考。因此，西汉前期胡汉交流中“戎为禽兽”的概念，将分为四个阶段的衍化过程予以讨论，即早期贬低匈奴的“戎为禽兽”论、打破“戎为禽兽”论的迷思、“戎为禽兽”论用为论辩说辞，以及开始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展开论辩。

一、托词“禽兽”以达贬斥之效

先秦时，生存于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因文化风俗不被理解，从而在中原人之中产生了视少数民族为禽兽的论调，其中例子已在前文论述。到了汉代，“戎为禽兽”致使汉人普遍上认为匈奴的地位是极其卑微而弱小的。该观念一直延续到白登山之围，才在匈奴强者形象的建立下淡薄消退。

就算如此，白登山之围后汉人之中依然盛行唯我独尊的观念。例如在贾谊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汉朝为主，匈奴为臣，本应顺从、奉承汉朝的卑微之姿。然而就当时形式而言，匈奴却是屡次侵犯汉朝，以下犯上，不可容忍。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贾谊撰，2000：131）

这种汉人为尊而贬低蛮夷的观念，是汉人在匈奴强大形象的打击下产生自我安慰的结果。他们借此贬低匈奴，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把匈奴的侵扰说成是不义之举。例如贾谊的言辞便不乏针对匈奴的贬义形容词。

建图者曰：“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为我狡猾……”（贾谊撰：2000：135）

这样的说法，仿佛匈奴只有负面与贬义的本性，更是作恶多端与狡猾不义的一群人。这种负面形象根深蒂固于汉人的思想之中，确实有利于汉文帝发兵的心理战术，同时却也阻碍了汉人接受匈奴族群。

二、打破“戎为禽兽”论之迷思

然而六年后，晁错在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 169 年）的上谏中已不见任何对匈奴的偏见。此时朝廷已不再需要贬低匈奴作为心理战术，反而需要晁错这服务实与就事论事的谋略，把匈奴放在对手的位置。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文帝嘉之。
“……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兵厚六尺，事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班固著，1962：2282-2285）

事实上，晁错正是汉代史上首位提及汉人与匈奴从文化到军事上的不同之处，点出了匈奴与汉人在生活习惯上所产生的冲突以及其所带来的军事优势。难能可贵的是，晁错的建议中并不排斥其他有着同等习俗的少数民族，甚至为了知己知彼而让将兵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

换言之，自汉文帝中期以来，匈奴已是汉人军事意义上的对手。他们客观看待匈奴的强弱而不迷惑于“戎为禽兽”的偏见，且更能理性地分析两者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就如在韩安国与王恢的论辩中，双方各自从生活习俗、兵法等方面理性分析匈奴与汉人，以达成自己的主张。虽然当中不乏对匈奴的迷思，如韩安国因历代先帝失败而反对开战，但大致上而言，汉人已能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把匈奴当成是一个对手而非不足为患的“禽兽”。

三、“戎为禽兽”用为论辩说辞

然而，这并不意味“戎为禽兽”论的消失。汉人之中依然不断借着“戎为禽兽”论和贬低匈奴的方式，把汉朝放在正义的一方对匈奴进行讨伐，使汉朝上下对匈奴深恶痛绝，则出兵之举名正言顺。例如汉武帝在提到匈奴时，必会用上许多负面的形容词：

“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司马迁撰，1959：2473）

汉武帝将匈奴抨击成多行不义和为非作歹的言论在当时非常兴盛，以达到贬低匈奴的目的。而“戎为禽兽”论更是被汉人加以利用，如王恢以畜养的“畜”字套在匈奴上，表示应该以对待畜生的方式对待匈奴¹⁶；韩安国则以“禽兽之心”形容匈奴的贪婪、“鸟举”形容匈奴常年迁徙的生活习惯¹⁷。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汉武帝改元一事。适时朝廷大举讨伐匈奴，汉武帝以恶禽猛兽处之，以“狩”字代表汉朝对匈奴的“狩猎”。

¹⁶ 《汉书·窦田灌韩传》：“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班固著，1962：2401）

¹⁷ 《史记·韩长孺列传》：“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疆，自上古不属为人。”（司马迁撰，1959：2861）

军上对曰：“……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班固著，1962：2815）

当时，终军以“禽兽行”和“虎狼心”形容匈奴，汉武帝正好借着“戎为禽兽”论而有所发挥。此外，汉武帝还诏曰“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姦巧边萌。”（司马迁撰，1959：2112）以告诫燕王不可疏忽防备匈奴之心。由此可见，匈奴的“禽兽”形象在汉武帝时都不曾消逝，“戎为禽兽”论作为一种手段不断地流传，以“禽兽”、“畜生”等字眼作为抨击匈奴的方式。

四、以文化根据立论思辨

虽然如此，匈奴的禽兽标签在汉武帝时也已发生本质上的改变。随着两者关系的演变与接触，汉人已经能把对手与禽兽作出分别，并为双方的民族关系作出深刻思考。意大利学者托玛索·泼罗瓦朵将这种情况总结为“蛮夷原型”：

“中原王朝初次和游牧者达成了妥协始于汉朝……匈奴逐渐上升为一种区别于中原华夏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的‘蛮夷原型（archetypal barbarian）’，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不同的民族部落的看法。（托玛索·泼罗瓦朵，2012：124）

如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淮南子》里的思想，都是汉人以文化为根据而展开的思辨，更是他们对匈奴形象的思想趋向成熟的体现。对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思想，韩兆琦的〈司马迁的民族观〉与池万兴的《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中已有详细论述，故本文更着重讨论《淮南子》所达到的思想成就。

首先，《淮南子》的作者将匈奴的侵略看待成争取资源以存活下来的自然本能。他不再将匈奴当成因“禽兽心”而粗暴地侵略边境为非作歹，而是将匈奴当作一群需要资源的人群。

“……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何宁撰，1998：37-38）

如此一来，等于是将匈奴的侵略之举归类为寻求生存的无奈之举，不应责怪他们。这种突破性的说法，是汉人首次以“道”的层面为匈奴的举动作解释，对解开双方仇怨意义重大。

《淮南子》也对汉人与匈奴的文化差异深入思考，包括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区别：

“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驢马而服駟騄……”（何宁撰，1998：624）

文化与风俗，正是两者难以相融的重要因素。由此证明，胡人——包括匈奴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已是汉武帝时期汉人认真关注的课题之一，并对此进行成熟的思想工作。例如在《淮南子》中，作者甚至触及信仰课题：

“……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何宁撰，1998：779-780）

作者认为，风俗的差异是由于信仰不同，而信仰作为形而上的层面，并无对错可言，匈奴与汉人的风俗更无对错之分。作者把命题提升至形而上的信仰方面，都是对匈奴作出了深一层认知和思考的结果，为日后汉人与匈奴之间的融合和文化接受建立了思想奠基。

第二章 北方汉匈交流概况与其影响

第一章探讨了汉人最后打破误解，客观面对异族的情况，促使双方民族得以展开较为频密的交往。其中，汉人和匈奴透过几种方式开始进行最早交流，方才有了后续的发展。如自汉高帝开始，朝廷便屡次派遣汉人女子前往匈奴和亲，但和亲活动显然无法为双方交融产生正面影响。反之，汉人来到胡人的地区，所面临的格格不入却非常明显：

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班固著，1962:3903）

这充分体现了汉人女子对北方生活的不习惯以及对汉朝的思念，可见文化对和亲女子所形成的牵绊。而和亲作为求和的手段，使汉人女子只能默默忍受他族的风俗与生活习惯。以此类推，和亲活动对双方交流的意义并不大。

除和亲外，还有汉人以商人、使者的身份在北方生活过一段日子，甚至直接投靠至匈奴，他们便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其中，投降匈奴的汉人在北方的身份地位不低，从而有了决定自己文化归属的权力，这是他们与和亲女子不同之处，但两者都受到了汉文化的牵绊。本章将分为两个部份，第一节讨论投降至匈奴的汉人多情势所迫，身不由己，虽接受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却在最后纷纷产生想回归汉朝的现象。第二节则探讨那些曾在北方生活过的汉人，并着重讨论这群人在胡汉关系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节 汉人羈北之缘由与心态

在匈奴大帝国下，不时可以看到汉人投降至此。汉朝第一批投降匈奴的汉人包括韩王信及其部众。白登之围后，匈奴与汉朝的对立致使部分造反的诸侯将匈奴列为合作对象¹⁸，包括陈豨、卢绾，还有汉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汉景帝时的赵王，而卢绾也在最后与家属部众逃亡至匈奴。汉武帝时期则以个人投降至匈奴为多，包括武州尉史、李陵、李绪、李广利、管敢、卫律、虞常及张胜。他们投降匈奴前后的情况在马鑫与尚焯的〈试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将领〉，以及蒋晓莹的〈从《史记》看汉匈关系对刘邦大臣谋反的影响〉中已有完整论述。投降至北方的汉人对匈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在崔明德、庄金秋、马勇等人的论著中得到全面解析¹⁹，故本文只对汉人大臣入北之迫不得已和常复思归之心态作出进一步探究，来论证汉文化和民族身份对他们的牵绊。

若将这群人并列，可以发现他们投降至匈奴都是不得已之举，投降以后也始终紧系对汉朝的归属感。就如郑晓云所述，“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的感情取向与价值取向都是不一致的。长期受自身文化的熏陶，使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有深刻的认同，这种认同自然也表现在人们的感情上。”（郑晓云，1992：75）其中的例外，便是中行说。这与其成长于边塞的背景有关。作为长期与胡人接触的燕

¹⁸ 夏增民在〈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中补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这些敌对的政权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为可以与汉政府相抗衡”，也就是说，匈奴在这些人眼中是平等的政治对象。详见夏增民（2005），〈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6期，页12。

¹⁹ 详见崔明德、庄金秋（2008），〈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21卷第2期，第65-77页；马勇（2010），〈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3期，第111-114页；王庆宪（2004），〈匈奴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06期，第68-70页；王庆宪（2005），〈生活在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03期，第47-52页；王庆宪（2006），〈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04期，第80-87页；王庆宪（2006），〈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06期，第61-65页；吴明月（1995），〈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年04期，第87-94页。

人，中行说不似中原汉人般对匈奴抵触巨大，加上报复汉朝派其出使匈奴的心态，所以才尽心为单于出谋献策。除了他以外，其他汉人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匈奴，于此可见接受汉文化熏陶的汉人排斥投降匈奴。接触匈奴文化后，这些汉人更不约而同产生“思归”的心态，而这种情况在韩王信、卢绾等早期投降匈奴的汉人身上最为明显。本文遂将他们的迫不得已以及常复思归的心态分为两个部份，以更好地体现汉文化对这些人的牵绊。

一、迫不得已之选择

追根究底，造反失败与逃避死罪是早期汉人投靠匈奴的主要原因。就如吕祖谦便将韩王信的投降归咎于汉高帝的猜疑：“高祖猜疑责让，使其以国外叛，为虏向道，遂有平城之围……”（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汇辑，2005：536）确实如此，韩王信在马邑遭匈奴围攻时，只是打算与匈奴和解，并无投降匈奴的意愿。当遭汉高帝怀疑后，韩王信为免被诛，只好投靠匈奴。卢绾更是一开始便无意投降匈奴，而是想入朝谢罪以请得汉高帝的原谅，却逢汉高帝驾崩，无奈之下方才逃亡至匈奴。

汉武帝之时，军事上的失败也导致更多汉人投降匈奴。其中，马邑之谋时便有如此记载：

（单于）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

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司马迁撰，1959：2862）

武州尉史被虏，为了保命只好把王恢的计划告诉单于，成为汉武帝时第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至于李陵，则在战败于匈奴单于时投降匈奴：

……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司马迁撰，1959:2878）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推测李陵投降是为了让匈奴停止攻击，保全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司马迁也对李陵投降一事作出如此辩解：“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班固著，1962：2456），可见李陵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直到汉武帝误以为李陵帮匈奴练兵，大怒之下诛杀李陵全家，李陵方才彻底断绝了回归汉朝的想法。至于李广利因与丞相刘屈氂合谋立李夫人所生之昌邑王刘髡为太子，事迹败露，导致妻子被下狱。就算如此，李广利亦未一开始就投降匈奴，而是打算在与匈奴对战中取得胜利以赎死罪。无奈兵败之下无计可施，方才投降匈奴。至于张胜，则是因参与到谋劫阼氏的行动失败²⁰，而被迫投降匈奴。

此外，根据数据统计，汉高帝至汉文帝期间，共有十六个诸侯王反叛汉朝²¹，但其中也只有四人选择与匈奴合作²²。双方只是作为军事上的合作伙伴，并不涉及任何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这些汉朝诸侯也无意成为匈奴的一份子。数据也显示，与匈奴合作的四个诸侯王中，就只有韩王信与卢绾二人选择逃亡至匈奴，于此证明了投降匈奴的汉人只占极少部分。

二、常复思归之心态

为了利益，韩王信能够加入匈奴军攻击汉朝，也能够游说陈豨造反。然而在北方的六年中，韩王信显然并未对匈奴产生归属感，一如其在临死前所表现的悔意：

²⁰ 详见《汉书·李广苏建传》：“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缙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缙王者，昆邪王姐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阼氏归汉。”（班固著，1962：2460）

²¹ 详见附录表二：汉高帝至汉景帝间反贼与匈奴合作列表。

²² 详见附录图一：汉高帝至汉景帝间反贼与匈奴合作数据。

“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司马迁撰，1959：2635）

根据记载，韩王信投降后成为匈奴将领之一，可见匈奴未对韩王信产生排汉心态。不过，由于不习惯异地、异族、异俗，以及屈就匈奴以存活的无奈，“乞贷”二字正好形容了其寄人篱下的情况。卢绾在匈奴的生活更是不尽如意，虽被单于封为“王”，但其管辖之地却常遭其他异族人欺凌侵夺。如此更导致其无法对异地产生归属感而“常思复归”²³。至于随他投靠匈奴的妻子，也在十五年后返回汉朝。

卢绾妻子亡降汉，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高后竟崩，不得见。卢绾妻亦病死。（司马迁撰，1959：2639）

卢绾在投靠匈奴一年后即死于匈奴之中，对匈奴无法产生归属感或在情理之中。但其妻子在匈奴之中生活了十五年之久，仍于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回归汉朝，可见汉朝始终是她所认定的“归属”。由此可见，西汉早期投降匈奴的汉人心思汉朝，并且皆未融入为匈奴的一份子，文化交流极为薄弱。

汉武帝之时，随着客观的接触与了解，加上投降的汉人在匈奴的地位大大提升，促成了他们更容易融入匈奴之中，如李绪便因练兵一事受到单于礼遇²⁴。至于李陵在投降至匈奴后，更是参与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战斗，与匈奴入侵上谷和五原。此外，单于赞赏李陵的壮勇，还将女儿嫁给他，并封其为右贤王，外派到领地，遇到大事还有参与决议的权力。李陵在匈奴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和先前归降匈奴而被封作丁灵王的卫律一同受到单于信任，不仅参与匈奴对汉朝的军事行动，也有在外交活动中接待汉朝使者的记载。至于李广利，

²³ 详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司马迁撰，1959：2639）

²⁴ 详见《汉书·李广苏建传》：“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班固著，1962：2457）

以贰师将军的身份投降匈奴，自然倍受欢迎，娶得单于之女，地位甚至在卫律之上。

但若深究汉武帝时这些汉人的归属感，却可以发现李陵的矛盾之处²⁵。史书记载，李陵投降约十二年后，任立政等人曾出使匈奴欲劝李陵归汉：

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班固著，1962：2458）

李陵作为匈奴的右贤王，穿着他们的服装，作匈奴的打扮，仿佛已经完全属于匈奴。然而，若与当时也投降至匈奴的其他汉人相比较，李陵对匈奴的贡献却是最少的，只是参与过一次攻打汉朝的战役，而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一个地方王为单于管理当地事务。由此，便可以觅知李陵或许并未全力以赴为匈奴作出贡献，否则以他在与匈奴对战时所展现的军事才能，大可如李绪那般的为单于练兵，甚至带兵出征。至于卫律对李陵的友好，更可以探知李陵无心于匈奴的权位，所以不会威胁到卫律的地位，故卫律不会像杀害李广利那般对李陵充满敌意。再从李陵对苏武的对话记载中，李陵对家族被汉武帝所诛的绝望，而后对苏武得以回归汉朝的祝贺，都可对李陵的心态略览一二。可以断定，李陵确实已断绝了回归汉朝的念想，以匈奴的习惯与文化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若提及归属感，李陵或许对汉朝失望，但却不能因而认为其已归顺匈奴。

²⁵ 在汉武帝时投降的汉人中，李绪与李广利到匈奴不久就已被杀，未能见得他们归属感的后续发展，故未加以讨论。

第二节 北地胡风南传之途径

无论是往来边境的商贾，投降匈奴的汉人后代，还是被扣留的汉朝使者，作为羁留其中的远客，这些汉人在匈奴的大环境中所能形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又因史书并无记载他们归汉以后的事迹，故无法觅知接触过“匈奴文化”的他们，在汉文化的大环境中是否有着具体影响。这些人亲身经历了跨文化交际与文化冲击，为汉匈关系和思想带来的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²⁶。

本文首先论述投降匈奴的汉人后代回归汉朝的情况。汉朝使者的讨论特别以张骞和苏武两个代表性人物为叙述对象，而第三部份则论证私人商贾往来两地的存在。由于身份的高低，所接触的文化、知识和思考层面各有不同，故而内文中会特别釐清这三个群体在面对胡汉文化转换的具体情况。

一、羁北汉人后裔之归国

韩王信、卢绾等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后代自小接受匈奴的生活方式，与匈奴人相处，最后却纷纷回归汉朝。其中，韩王信之子韩颓当与孙子韩婴，于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56年）回到汉朝²⁷，象征第一批从小接受匈奴文化熏陶的汉人来到了中原。卢绾的后代——卢他之，也在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回

²⁶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即是一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的一种现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遇各种各样的尴尬，文化冲击乃其中之一；文化冲击 (culture shock) 作为一个术语于 1958 年由美国人类学家 K. Oberg 首次提出，也译作“文化休克”“文化震惊”等，用来形容一个人到了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焦虑感与失落感。（江丽容，2007：61）

²⁷ 详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韩太子亦生子，命曰婴。至孝文十四年，颓当及婴率其众降汉。汉封颓当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司马迁撰，1959：2636）

到汉朝²⁸。这些人的回归，是不是代表他们内心深处和祖先一样对汉朝产生归属呢？

虽然他们在匈奴的身份地位也不算低，卢他之在匈奴时更拥有东胡王的地位，但匈奴贫瘠与困苦的生活条件，在中原生活条件的相比之下依然显著。反之，汉朝朝廷回归的汉人给予封侯的奖励，则保证了他们回到汉朝时拥有丰厚的生活条件。如此一来，这些人回到汉朝后是否仍过着匈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如若不然，自小接受匈奴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学习汉人文化时，是否也会面对无法适应的问题？史书虽未对这些人回归以后的生活有所记载，但可以确定这些熟悉匈奴文化的汉人在回到全是汉文化的环境时，必深刻体会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二、汉朝使者之获释南返

随着连连的征伐，汉朝与匈奴的使者活动也变得频密，而王庆宪在其〈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已有所涉及²⁹。本文的重点在于揭露使者对双方民族与文化接触的意义，而不再论及他们的政治层面。史书记载了使者被统治者挽留于当地的事迹：

“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允国等，前后十余辈。

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班固著，1962：2459）

既然被委任为使者，表示他们朝廷大臣的身份、教育层度和生活上优厚是想当然的。当他们被迫留在匈奴时，当地文化对这些养尊处优的汉人所造成的冲击，

²⁸ 详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司马迁撰，1959：2639）

²⁹ 详见王庆宪（2005），〈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32卷，页75-81。

无疑是促成他们对双方文化进行深刻思考的触发条件。与此同时，这些使者却始终抱持着对汉朝的身份认同，在匈奴这个大环境下区分出本身汉人的身份自觉，因而不会被匈奴人同化。这些使者在最后都选择回归汉朝，反映了汉文化对汉人依归的牵绊。

其中，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先驱者，更与匈奴有过频密接触。当时，张骞出使月氏，途经匈奴时遭单于挽留。他在接受匈奴文化和生活方式十多年后，并未因此而忘记其汉人的身份，反而尽力完成其作为汉朝使者的任务，再携当地妻子回归汉朝³⁰。史书还记载了张骞倍受胡人喜爱的事迹：

骞为人彊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

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司马迁撰，1959：3159）

由此可见，张骞虽忠于汉人的身份和归属，却也不排斥外族之人。十多年与匈奴人相处的经验，迎娶当地女子为妻，更使他深入了解匈奴这个民族与文化，在和异族人的接触上展现了汉人与胡人和谐相处的可能。

苏武则于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被委派出使匈奴，并同样被单于扣留十余载³¹。谈到苏武时，除了他的气节不屈，我们也应该留意十多年的遭遇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汉书·李广苏武传》还记载苏武曰“胡妇适产一子通国”（司马迁撰，1959：2468）。张骞和苏武生活于匈奴之中十余年，苏武甚至和不少投降匈奴的汉人交往，包括李陵、卫律，还有与其同时期却投降匈奴的使者——张胜与虞常等人。他们接触的人、事、物不再局限于汉人和汉文化，所经历的层面必然比较广阔，而不复出使匈奴前局限于汉文化的狭隘思想中。

³⁰ 详见《史记·大宛列传》：“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司马迁撰，1959：3159）

³¹ 详见《汉书·李广苏建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彊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班固著，1962：2467）

三、往返南北之私人商贾

史书还零星记载汉人作为私人商贾出入匈奴的事迹。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 148 年），“（惠侯宋九）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班固著，1962：588）；汉武帝之时，“（阳平侯相夫）阑出入关，免。”（班固著，1962：601）、“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阑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司马迁撰，1959：2905）、“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司马迁撰，1959：3109），都证明了汉朝时已有不少汉人私下与匈奴交易。

现今学者对这些商贾的讨论，都只着重于他们作为双方物资交换的媒介。不可否认，大量的汉人用品透过私人商贾流入匈奴，导致匈奴一些生活习惯早已受到汉文化影响。然而，这些商贾于汉匈之间游走，长期往来边境，同时也是双方百姓长期交往的证明，是带动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群体。在研究这些私人商贾时，不应该单看汉文化如何透过商贾对匈奴产生影响，也要注意这群人是否也受到匈奴文化的冲击，以及他们在北方入乡随俗的表现。他们来回于两地之间，呈现出的也许就是两种文化特色融合的个体。

第三章 中原汉匈交流概况与其影响

匈奴进入中原的现象也同样为汉人与匈奴的接触带来重大意义。大量的匈奴俘虏与投降者，致使中原有了匈奴人的存在。朝廷将这些匈奴俘虏安置为汉民或奴婢，导致双方趋向生活化的交流，而低微的奴婢在一定层面上造成俘虏被动地受汉人影响。反之，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被封为列侯，又带着跟随者建立属国，在属国的地方上处于文化主导地位。随着双方接触与了解越趋成熟，这些匈奴方得以融入周围都是汉人的将兵之中从军建功，并在相互接受、并肩作战之余，被汉军所同化。

就群体而言，匈奴俘虏的为奴为民，屯兵于边塞和通关市的举措，以及属国的建立，导致双方的接触大量化与平民化，且广布中原各地。林干先生统计，“截至宣帝末年为止，匈奴人附汉的，大约共有十余万人，而历次战役阵前被俘而后归附的，尚不在内。”（林干，1986：90）本文第一节将讨论匈奴俘虏、屯兵与关市所带来的大量化与平民化接触。至于列侯和随之组建起来的属国，因其文化地位主导的特殊性，故令立一节讨论。而在朝廷与军中的匈奴人作为少数群体，决定了他们被汉人影响与同化的局面，则是本文在第三节所要探讨的部份。

第一节 俘虏、屯兵与关市

匈奴大量被汉化的过程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彼时，频密的战争在卫青和霍去病领兵胜利下，意味着大量的匈奴士兵被俘虏³²。匈奴俘虏进入中原，或为

³² 详见附录表三：汉武帝时期捕获俘虏列表。

奴或为兵，甚至成为汉朝之民。匈奴把自身的生活习惯带进中原，而中原的文化也影响着他们。例如史书提及张骞出使月氏时，是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司马迁撰，1959：3157），印证了胡人在汉朝为奴的例子³³。这一批批数量不少而地位低下的异族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汉朝，并且为了生存而融入了汉文化这一大环境。

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屯戍和关市对双方文化交流带来的意义。朝廷派兵屯戍的举动，可追溯至汉文帝时期。当时，晁错向汉文帝提议募民实边的举措以便让汉人得以了解胡人的习俗：

“……乃募臯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臯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虏之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班固著，1962：2286）

当时，士兵守塞实行每年轮替的惯例，导致他们无法拥有足够时间了解对手。晁错便是在赢得战争的功利目的下强调了解胡人的重要性。因此，朝廷展开了募民实边的举措，以赎臯赐爵鼓励奴婢、平民百姓迁徙到边境居住。杨芳透过考古得出 3 万多枚汉简，揭露汉代在居延屯戍的面貌，便是其中很好的例子³⁴。

关市更是西汉与匈奴人民展开和平交流的最初平台。林干推测，关市在刘敬往结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林干，2007：45）；吕后、文帝时期曾讨论禁止部份物品流入匈奴的话题³⁵，证明关市在当时的存在，并受到朝廷管制的情况；

³³ 再按《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注“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师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可以确认堂邑父即汉人中的胡人奴婢之一。

³⁴ 详见杨芳（2006），〈汉代居延塞在抵御匈奴中的作用〉，《河西学院学报》，第 22 卷第 1 期，第 13-16 页。

³⁵ 详见《资治通鉴·汉纪五》：“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司马光编著，1956：446）

汉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司马迁撰，1959：2904），以及汉武帝“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司马迁撰，1959：2904），这些都证明了关市活动一直活跃于西汉时期，虽曾一度中断，却还是成为了双方百姓的经济交流主力。正是由于朝廷实行屯兵迁民于边塞的举措和关市的存在，“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司马迁撰，1959：2904），意味着大批汉人与匈奴在边塞展开了日常和长期的接触，促进了边境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归降于汉朝之匈奴贵族

史书记载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多不胜数，而匈奴人的投降可以从汉景帝说起。汉文帝的文书中曾透露当时已有匈奴降民：“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司马迁撰，1959：2903），然史书并无更多记载。接着，便是汉景帝接受匈奴人的事迹³⁶：

中三年，安陵侯子军、桓侯赐、道侯陆疆、容城侯徐卢、易侯僕黜、范阳侯代、翁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为列侯。（司马迁撰，1959：445）

汉景帝不但接受了敌人投降，还给予封侯奖励，就此开启了匈奴人作为非汉人，却成为了汉朝列侯的先例。自此以后，前来投降的匈奴人随着汉武帝时期频密的对战而剧增。

汉武帝时，史书详细记载就有 18 人³⁷，而这些人的跟随者更是多不胜数。这 18 人在匈奴本就有着一定的身份地位，如匈奴王、都尉、大当户，甚至还有单于太子，而来到汉朝以后又被汉武帝封侯赐国，保证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作

³⁶ 详见附录表四：汉景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³⁷ 详见附录表五：汉武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为匈奴曾经的上层当权者，他们将匈奴贵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带入中原，又因其诸侯的身份而无需强制适应汉人的生活习惯。后续的具体影响，在谢明伟的〈汉代匈奴的内迁及其社会影响〉就已作讨论，故不再详谈。当然，随着匈奴人的诸侯之位的陆续断绝³⁸，匈奴以投降封侯的方式加入汉朝的情况和影响也随之消失。

匈奴人大量的投降的意义除了匈奴贵族文化的加入外，还导致了属国的建立³⁹。属国的决策有其目的与效果，在杨芳的〈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看汉对匈奴的外交策略〉中便提到属国有着接纳少数民族，吸引更多降者的作用。（杨芳，2006：180）朝廷将这些人安置在一起，导致汉朝境内一些地方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造就匈奴在这些地方的主导地位。对于附属国内的情形，史书也有记载：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司马迁撰，1959：2934）

朝廷让匈奴人在属国之中维持匈奴的政治方式⁴⁰，而得以延续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匈奴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并且得以“保有其匈奴的民族意识”⁴¹。因此，在这些地方上，异族文化色彩鲜明，成为汉朝境内的特色。更甚者，匈奴文化对其属国内的汉人，以及周边的汉人城池，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匈奴人也会被汉人文化所影响。可以确定的是，属国的组建促成

³⁸ 详见附录表四：汉景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和附录表五：汉武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³⁹ 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班固著，1962：735），可见当时属国的结构完善、颇具规模。

⁴⁰ 详见朱圣明在《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表示：“这里的本国之俗，不能理解成一切风俗，而只是原有的政治统治的习俗方面，如属国少数民族部落组织得以保留，统帅地位得以承认等。”（朱圣明，2009：46）

⁴¹ 详见李静、李丽（2007），〈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青海民族研究，第18卷第3期，页62-66。

了汉人与匈奴人的杂居，双方的接触趋向大面积、平民层面的交流，让双方普通百姓有机会互相了解并消除隔阂。

虽然如此，匈奴人的投降封侯并不代表着汉人与匈奴的融洽。汉景帝与汉武帝不过是想利用此举吸引更多匈奴投降，可见匈奴对他们来说是可利用的敌对关系，而朝臣对于匈奴人的投降与封侯更有着不小的反对声浪：

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

（司马迁撰，1959:2078）

周亚夫对匈奴的投降是抗拒的。在他看来，投降而来的匈奴人是不义且不守节的，极其不赞同汉景帝对这些人封侯。汲黯也曾曰：

“……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钜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事者家；鹵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

（班固著，1962: 2320）

汉人与匈奴多次对战，带来的是将兵死伤，两方仇恨不能轻易得以消除是为理所当然。在汲黯看来，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应该成为汉人的奴婢。因此，朝臣与匈奴列侯的关系不融洽可想而知。只能说，匈奴人的投降与属国的建立，导致双方有了接触的机会，并且在往后更多的交流和了解中有了交融的可能性。

第三节 借军政累劳积功之匈奴

西汉早已存在着胡人所组成的骑兵部队（简称胡骑），还有不少异族人担任汉朝将军。根据记载，这种军中的胡人建制在汉武帝时便已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

胡骑，不常置。”（班固著，1962：737-738），证明了汉武帝时便有了掌管胡骑的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的官职，可见胡骑的数量与规模。

除此之外，史书还记载了匈奴人加入汉军的实例。自汉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起，便有类似记载：

“翁，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属车骑将军，击匈奴有功，益封。”

（司马迁撰，1959：1027-1028）

记载可见朝廷除了封匈奴为侯，还让他们有机会加入汉军击打匈奴。其他投入汉军的匈奴列侯还包括了昌武侯赵安稽和襄城侯乘龙。更甚者，还有匈奴人因立了军功而被朝廷封侯的例子，包括宜冠侯高不识、焯渠侯仆多、壮侯复陆支与众利侯伊即鞬⁴²。这些人大多跟随卫青和霍去病成为大军的一员，并且义无反顾地出击匈奴。

朝廷权位之中还可以一觅匈奴的影子。在军中，早有异族人担任将军一职，包括开陵侯成婉、公孙贺与赵信。例如史书记载公孙贺为将军的事迹：

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以轻车将军出云中。

后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后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贺

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司马迁撰，1959：2941）

公孙贺更是在后来位至丞相⁴³，可见朝廷并未因其义渠人的身份而有所排斥。至于赵信，可以说是汉武帝时第一批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虽然汉朝和匈奴在当时对战得不可开交，朝廷依然让身为匈奴的赵信担任将军攻打匈奴。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翁侯。武帝立十七岁，为前将军，与单于

战，败，降匈奴。（司马迁撰，1959：2944）

⁴² 参见附录表六：匈奴立军功封侯之列表。

⁴³ 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后八岁，以太仆为丞相……”（司马迁撰，1959：2941）

然而，赵信却又回归匈奴，更是以其在汉朝的经历为单于出谋策划⁴⁴。正是自赵信以后，朝廷方不再委任匈奴人为将军去攻打匈奴，以免匈奴人有机会带兵返回匈奴，造成损失。但透过赵信与公孙贺的例子，可以确定汉武帝时已不再排斥其他异族人，也不再拥有任何偏见。

除了军中，朝堂之上也同样有着匈奴的影子。除了公孙贺当上了丞相，还有金日磾辅助汉武帝与汉昭帝，备受宠爱，官至太子太傅，列侯阴泽世至子孙。

秬敬侯金日磾，以駙马都尉发觉侍中莽何罗反侯，二千三百一十八户。

始元二年侯，丙子封，一日薨。始元二年，（子）侯赏嗣，四十二年薨，亡后。

元始四年，侯常以日磾曾孙绍侯，千户，王莽败，绝。（班固著，1962：666）

无论是公孙贺还是金日磾，都证明了汉朝与匈奴之间已非势不两立，反而让他们位居权势之位，成为朝廷重臣，甚至成为拥有兵权的将军。当然，处于汉人环境的大背景下，这些匈奴人不过占少数，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处于受汉文化影响的被动地位。

以金日磾汉化的例子为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言其母亲于甘泉宫的图画，“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泣，然后乃去。”（班固著，1962：2960）按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的旧俗⁴⁵，匈奴人尊老孝顺的观念应当非常薄弱。以上记载即可反映出金日磾受到汉人礼仪人伦观念的影响，谨慎侍君辅政，紧守忠孝之道，甚至因不喜儿子淫乱而杀之。透过金日磾汉化的一些现象，可以推测其他来到汉朝的匈奴人，也会在时间的推移下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俗、言行等，甚至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思考模式和价值观。

⁴⁴ 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翁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司马迁撰，1959：2934）

⁴⁵ 详见【汉】司马迁撰（1959），《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页2879。

结语

汉人与匈奴在汉初至汉武帝期间已展开各种形式的接触和交流。汉人或投降至匈奴，或有使者被拘留于其中，以及从小在匈奴长大的汉人后代，皆是汉人曾与匈奴接触并共同生活的经历。史书也记载匈奴人融入中原，比如俘虏、屯兵、关市等促使匈奴与汉人的长期接触。大量匈奴或透过以上方法，或投降汉朝，而成为中原的一员。随着双方的各种交流，一些根深蒂固的匈奴形象也随之转变。正如本文所言，汉人对匈奴的成见从一开始的“戎为禽兽”论和弱小形象，到白登山之围后的强者形象，再到汉武帝时期开始懂得成熟思考汉匈关系。成见的消除，让汉匈交往渐趋频繁与密切，因此西汉初期可说是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汉人所撰写的史书只能体现出汉文化对汉人的牵绊，却无法提供匈奴文化是否对匈奴人有着同等牵绊的现象。与此同时，史书也没有深入记载汉人到匈奴区域后的文化影响和民族交融情况。所幸学者崔明德、庄金秋、马勇等人利用考古文物、出土文献等新材料⁴⁶，弥补了史书不足之处。此外，匈奴来到汉朝以后的情况，在汉武帝时由于时间仍不够长久，所以也无法知晓匈奴人为汉朝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与民族交融的情况。但如果将视线往后拉至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的时期，甚至更远的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或唐朝，倒是可以明确看出胡汉的民族与文化交融。本文旨在呈现汉人与匈奴最初的接触形式，故不谈及汉武帝以后的事迹。

至汉武帝时期，已经有匈奴在汉人朝中或军中行事的足迹。有些因军功而封侯，有些则在朝廷有所成就，比如金日磾和公孙贺，皆是匈奴融入汉人的证

⁴⁶ 同注释 13。

明。这说明了西汉初期的汉文化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汉人对汉文化产生深刻的心理牵绊，同时也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来丰富本身色彩。这正好显示出一个文化精神力量之强大，足以让本身的民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都想着回归并坚持自己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又能让其他民族为之向往。如郑晓云所言：

“成体系的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所引起的强制性整合，这其中还必须要融进其他文化的内容。这种整合可能有种种结果，或是经过吸收其他文化后整合为一种以自身文化为主体的新的文化，或是完全丧失自己的文化，被外来文化所融合，或是强行抵制，使自己的文化成为自己生存的象征，等等。”（郑晓云，1992：72）因此，文化对本身民族的人所形成的牵绊，以及和异文化之间的对峙和相容，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一股文化的内驱力来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变化。若能够探讨文化内驱力，必使研究汉匈交流的课题更具意义和价值，此乃本文未能深入触及之处。不过目前已有学者对此课题作出个别探讨，包括刘庆柱的〈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付春的〈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欧军的〈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两种文明的交融与互补〉、周作明的〈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比较〉、李静和李丽的〈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等。结合这些学者的见解，可以发现促使双方交流，进而交融的内驱力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其一，为了生存，也为了权力与经济土地的扩张，导致各个民族逐渐与周边的其他民族有所接触。其中最为鲜明的现象便是政权、民族之间因资源短缺而产生的冲突。再来，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思想、宗教等方面的进步，让少数民族在接触汉文化后被其同化，形成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汉人为核心

的中华民族对周围异族不断吸收的过程。漫漫中华历史，汉人与匈奴的关系，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包容与吸纳，更是民族之间从交流与冲突走向交融的典范。

参考书目

一、古籍

1.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2.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2000），《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3.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4. [汉]司马迁撰（19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二、专书

1. 池万兴（1995），《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 何宁撰（1998），《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3.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1998），《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4. 李学勤主编（1999），《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5. 林干著（1986），《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6. 林干编（1988），《匈奴史料汇编》，上编，北京：中华书局、
7. 林干著（2007），《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8. 马丽清著（2005），《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9. 徐元诰撰（2002），《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0. 武沐著（2005），《匈奴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11.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汇辑（2005），《史记集评》，北京：华文出版社。
12. 王明信、可永雪（2005），《史记人物与事件》，北京：华文出版社。
13. 郑晓云（1992），《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论文

1. 崔明德、庄金秋（2008），〈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21卷第2期，页65-77。
2. 付春（2009），〈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页1-8。
3. 高红梅（2001），〈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页29-34。
4. 韩兆琦（2005），〈司马迁的民族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2卷第1期，页1-3。
5. 江丽容（2007），〈跨文化交际：文化冲击与应对〉，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07年第4卷第3期，页61-65。
6. 蒋晓莹（2009），〈从《史记》看汉匈关系对刘邦大臣谋反的影响〉，《天府新论》，2009年卷S1期，页262-263。
7. 李静、李丽（2007），〈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8卷第3期，页62-66。

8. 刘庆柱（2006），〈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9卷第5期，页14-18。
9. 马晓丽（2007），〈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页47-52。
10. 马鑫、尚焯（2015），〈试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将领〉，《阴山学刊》，2015年第28卷第4期，页78-81。
11. 马勇（2010），〈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3期，页111-114。
12. 欧军（2003），〈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两种文明的交融与互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4期，页85-90。
13. [意]托玛索·泼罗瓦朵（2012），〈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23卷第2期，页123-125。
14. 王庆宪（2004），〈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06期，页68-70。
15. 王庆宪（2005），〈生活在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页47-52。
16. 王庆宪（2005），〈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32卷，页75-81。
17. 王庆宪（2006），〈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页61-65。

18. 王庆宪（2006），〈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页80-87。
19. 吴明月（1995），〈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页87-94。
20. 夏增民（2005），〈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页12-15。
21. 熊贵平、王扩建（2005），〈孝文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及影响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8卷第2期，页67-72。
22. 徐承娟（2007），〈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6卷，第117-120页。
23. 杨芳（2006），〈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看汉对匈奴的外交策略〉，《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6卷第2期，页179-180。
24. 杨芳（2006），〈汉代居延塞在抵御匈奴中的作用〉，《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22卷第1期，页13-16。
25. 雍秉乾（2000），〈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页43-44。
26. 张美华、张美娟（2003），〈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6期，页69-74。
27. 周作明（1998），〈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比较〉，《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页70-73。

四、学位论文

1. 冯博艺（2015），《西汉时期匈奴人员附汉内因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
2. 索明杰（2005），《匈奴对西汉王朝的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
3. 王庆宪（2003），《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博士论文，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
4. 王涛（2003），《略述匈奴与中原物质技术的交流以及汉匈在文化上的融合》，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陕西。
5. 谢伟明（2006），《汉代匈奴的内迁及其社会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长春。
6. 徐华灿（2014），《西汉时期汉匈和战中的相互招降策略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南昌。
7. 于亮（2014），《西汉匈奴降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8. 张天竞（2012），《论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9. 朱圣明（2009），《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河南。

附录

表一：汉武帝征伐年表

征伐时间	征伐目的	汉军将领	汉军人数	征伐结果
武帝元光二年 (前 133 年)	以马邑城为诱饵伏击单于	王恢、韩安国	伏兵三十余万	事泄一无所获
武帝元光六年 (前 129 年)	出上谷、云中、代郡、雁门分道击匈奴	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	各将万骑，共四万骑	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敖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全军覆没
武帝元朔元年 (前 128 年)	出雁门、代郡击匈奴	卫青、李息	三万骑	得胡首虏数千
武帝元朔二年 (前 127 年)	击匈奴楼烦、白羊王	卫青	不详	得胡首虏数千
武帝元朔五年 (前 124 年)	击匈奴右贤王	卫青及六将军	十余万人	获右贤王人众男女 1500 人，裨小王 10 余人
武帝元朔六年 (前 123 年)	出定襄击匈奴	卫青及六将军	十余万骑	得首虏前后 19000 余级
武帝元狩二年 (前 121 年) 春	击陇西匈奴	骠骑将军霍去病	不详	得胡首虏 8000 余级
武帝元狩二年 (前 121 年) 夏	过居延攻祁连山	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	数万人	捕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武帝元狩二年 (前 121 年) 夏	击右北平外匈奴	李广、张骞		杀匈奴三千余人（尽亡其军四千人）
武帝元狩四年 (前 119 年)	击匈奴单于、左贤王	卫青、霍去病	各将五万骑，共十万骑	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去病与

				左贤王战，斩首虏七万余级
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	击右贤王于天山	李广利	三万骑	得首虏万余级而还，汉兵物故什六七
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	出西河、居延北与单于战	公孙敖、李陵	公孙敖部不详，李陵将发兵五千人	公孙敖无所得，陵所杀伤万余人 后兵败降匈奴
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	出朔方、五原、雁门击匈奴	李广利、路博德、韩说、公孙敖	李广利将军六万骑、步兵七万，路博德将万余人，韩说步兵三万人，公孙敖将骑万，步兵三万人，共二十一万余人	李广利无所得，公孙敖失利
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出五原、西河、酒泉击匈奴	李广利、商丘成、马通	李广利将七万人，商丘成将两万人，马通将骑四万，共十三万人	李广利兵败投降，商丘成、马通无所得失

按：此列表选取自张天竞（2012），《论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硕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第24-25页。当中还参考了索明杰（2005），《匈奴对西汉王朝的政策》，硕士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第15页；徐承娟（2007），〈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6卷，第118-119页。然未及张天竞分类清楚了然。

表二：汉高帝至汉景帝间反贼与匈奴合作列表

谋反	谋反事迹	与匈奴合作	逃亡至匈奴
韩信	欲以假王守齐地……以韩信谋反，用陈平之计，诱捕韩信，废为淮阴侯	无	无
臧荼	臧荼反汉，攻下代地	无	无
韩（王）信	韩信恐诛，以马邑降匈奴，引兵击太原	与匈奴单于冒顿谋攻汉	高帝自往击之，韩信遂亡入匈奴
陈豨	反汉于代	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	无
卢绾	亦因谋反	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	亡走匈奴，客死他乡
彭越	高帝以谋反之罪，废彭越为庶人而徙蜀……吕后以后彭越欲复反而杀之	无	无
英布	恐被诛，乃起兵反汉。	无	无
淮南王刘长	淮南王长……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反	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	无
济北王刘兴居	起兵反朝廷	无	无
吴王刘濞	发动七国之乱谋反	无	无
楚王刘戊	参与七国之乱	无	无
胶西王刘卬	参与七国之乱	无	无
胶东王刘雄渠	参与七国之乱	无	无
川王刘贤	参与七国之乱	无	无
济南王刘辟光	参与七国之乱	无	无
赵王刘遂	参与七国之乱	北使匈奴，与连合攻汉	无

按：此列表整理自《史记·孝文本纪》、《史记·孝景本纪》、《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史记·黥布列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史记·楚元王世家》。

表三：汉武帝时期捕获俘虏列表

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	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阙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遼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	令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阾颜山赵信城而还。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柁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
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	代共王子邵侯刘顺，坐杀人及奴，以捕匈奴千骑，免罪。

按：以上列表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及《汉书·王者侯表》整理而得。此列表以明确显示“捕获俘虏”含义的文献为选取标准，其余具有“斩首虏”之模糊含义的文献不在选取范围内。

表四：汉景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受封人	受封时间	原身份	户数	所在郡县	侯国传袭
安陵侯子军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1517	平原	薨，无后
垣侯赐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	河东	-
遒侯李隆彊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5569	涿郡	至子，坐祝诅上，腰斩
容成侯唯徐卢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700	涿郡	至孙，坐祝诅上，腰斩
易侯仆隰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1110	涿郡	薨，无后
范阳侯代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1197	涿郡	至子，薨，无后
翁侯邯鄲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	匈奴王	-	魏郡内黄	坐行来不请长信，免

按：此列表选取自谢伟明（2006），《汉代匈奴的内迁及其社会影响》，硕士论文，吉林大学，长春，第23页；并根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略作称谓上的修改。当中还参考了徐华灿（2014），《西汉时期汉匈和战中的相互招降策略及其影响》，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论文，第9-10页；王庆宪（2003），《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博士论文，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第89页；于亮（2014），《西汉匈奴降民研究》，硕士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第59页；冯博艺（2015），《西汉时期匈奴人员附汉内因及其影响》，硕士论文，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第6页。然未及谢明伟分类清楚了。

表五：汉武帝时匈奴降汉封侯列表

受封人	受封时间	原身份	户数	所在郡县	侯国传袭
翕侯赵信	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年）	匈奴相国	1680	内黄	击匈奴，兵败，降匈奴
特轅侯乐	元朔元年（前128年）	匈奴都尉	650	南阳	薨，无后
亲阳侯月氏	元朔二年（前127年）	匈奴相	680	舞阳	坐谋反入匈奴，腰斩
若阳侯猛	元朔二年（前127年）	匈奴相	530	平氏	坐谋反入匈奴，腰斩
涉安侯于单	元朔三年（前126年）	单于太子			薨，无后
昌武侯赵安稽	元朔四年（前125年）	匈奴王		舞阳	至子，薨，无后
襄城侯桀龙	元朔四年（前125年）	匈奴相国	400	襄垣	至子，坐祝诅上，下狱瘐死
濼悼侯王援訾	元狩元年（前122年）	赵王	560	舞阳	薨，无后
下摩侯諱毒尼	元狩二年（前121年）	匈奴王	700	猗氏	至孙，坐将家属阑入恶师居，免
湿阴定侯昆邪	元狩三年（前120年）	昆邪王	10000	平原	至子，薨，无后
輝渠慎侯应疖	元狩三年（前120年）	匈奴王		鲁阳	薨，无后
河綦康侯乌黎	元狩三年（前120年）	匈奴右王	600	济南	至子，薨，无后

常乐侯稠雕	元狩三年 (前 120 年)	匈奴大当 户	570	济南	至子, 薨, 无后
湘成侯敞屠洛	元狩四年 (前 119 年)	符离王	1800	阳成	坐酎金, 免
散侯董舍吾	元狩六年 (前 117 年)	匈奴都尉	1100	阳成	至孙, 坐祝 诅上, 下狱 病死
臧马康侯雕延年	元狩六年 (前 117 年)	匈奴王尉	870	朱虚	薨, 无后
滕侯次公	元鼎四年 (前 113 年)	匈奴归义 王	790	舞阳	坐酎金, 免
开陵侯成婉	武帝天汉二 年(前 99 年)*补自 第 8 页。	介和王			至孙, 薨, 无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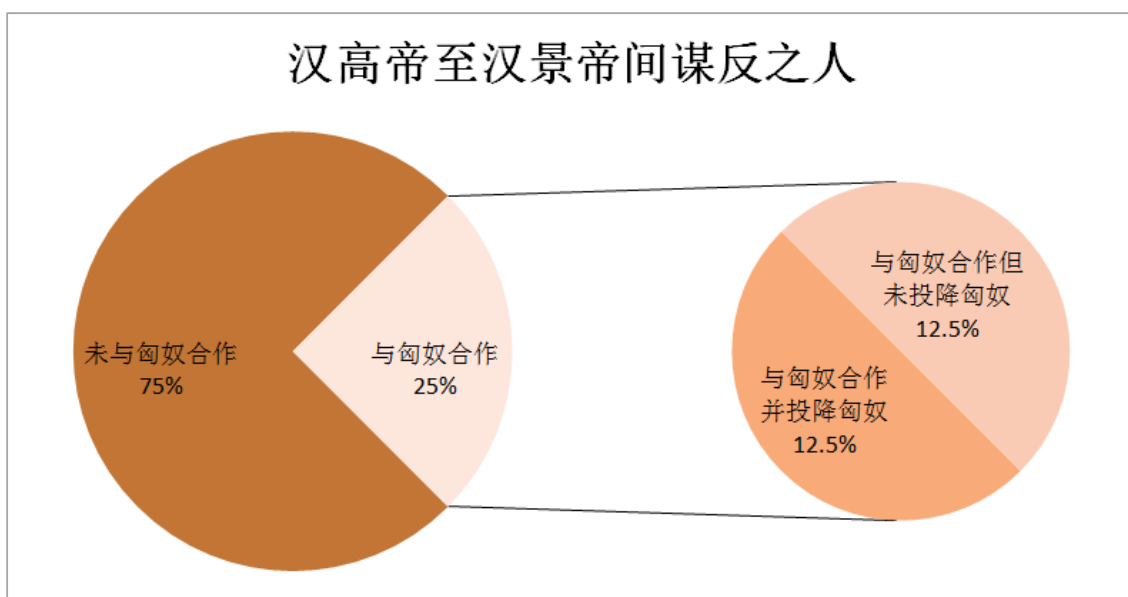
按：此列表选取自谢伟明（2006），《汉代匈奴的内迁及其社会影响》，硕士论文，吉林大学，长春，第 23 页；并根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略作称谓上的修改。当中还参考了徐华灿（2014），《西汉时期汉匈和战中的相互招降策略及其影响》，硕士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南昌，第 16-18 页；王庆宪（2003），《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博士论文，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第 89-90 页；于亮（2014），《西汉匈奴降民研究》，硕士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第 59-60 页；冯博艺（2015），《西汉时期匈奴人员附汉内因及其影响》，硕士论文，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第 7-8 页。然未及谢明伟分类清楚了然。

表六：匈奴立军功封侯列表

受封人	受封时间	封侯原因	户数	所在郡县	侯国传袭
宜冠侯高 不识	元狩二年 (前 121 年)	以校尉从票 骑将军再击 匈奴。侯。 故匈奴归 义。	1100	琅琊昌	坐击匈奴增 首不以实， 当斩。赎 罪，免
輝渠忠侯 仆朋	元狩二年 (前 121 年)	以校尉从票 骑将军再出 击匈奴得 王，侯，从 票骑将军虏 五王，益 封。 故匈奴归 义。		南阳鲁阳	至子，击匈 奴，没
杜侯复陆 支	元狩四年 (前 119 年)	以匈奴归义 因孰王从票 骑将军击左 王，以少破 多，捕虏三 千一百， 侯。	1300	勃海重平	至玄孙，坐 非子，免
众利侯伊 即轩	元狩四年 (前 119 年)	以匈奴归义 楼剌王从票 骑将军击左 王，手剑 合，侯。	1100		至孙，薨， 无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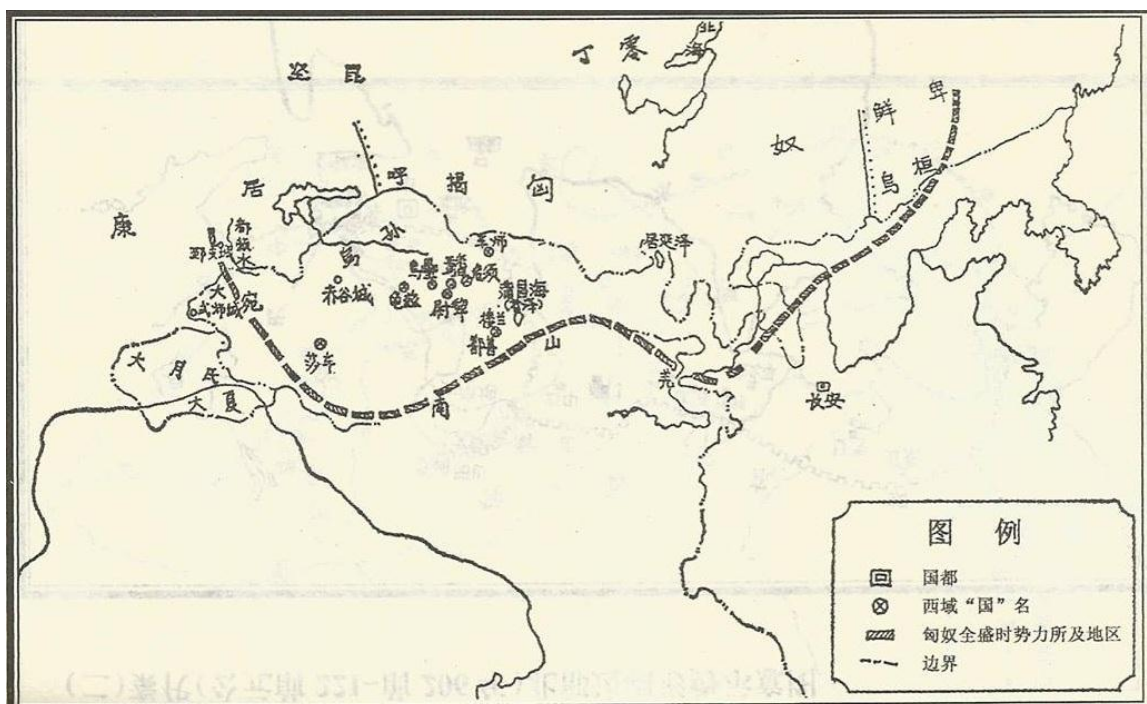
按：此列表选取自谢伟明（2006），《汉代匈奴的内迁及其社会影响》，硕士论文，吉林大学，长春，第 23 页；并以《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补充封侯原因。

图一：汉高帝至汉景帝间反贼与匈奴合作数据



按：此数据由附录二计算而出。可见谋反朝廷的汉人中（16个），只有25%的人（4个）选择与匈奴合作。在这25%中，又只有一半的人（2个）在最后投靠匈奴。

图二：西汉时期大漠南北形式示意图



取自：林干著（2007），《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40页。